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0034671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 著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説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説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説。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説：“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説；因为按照他的説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説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説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説。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説；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済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済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済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済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済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済学家把政治經済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済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済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已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责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説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會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457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説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已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幷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説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説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摈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